

AMERICAN POLITICIANS 看美国政客的嘴脸

美国政党和暴力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吗？
从两党之争，看美国谋杀率和自杀率背后的大阴谋

【美】詹姆斯·吉利根◎著
卢纪伟◎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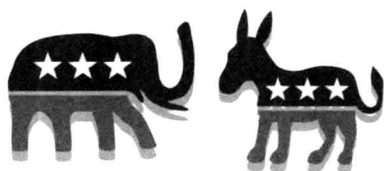


对于那些对美国政治感兴趣的人来说，此书是必读物。它会改变
你对我们两个主要政党的看法。

——乔治·索罗斯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AMERICAN POLITICIANS 看美国政客的嘴脸

【美】詹姆斯·吉利根◎著
卢纪伟◎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美国政客的嘴脸 / (美) 吉利根著; 卢纪伟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104-4253-7

I . ①看… II . ①吉… ②卢… III . ①政治—研究—美国
IV . 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5595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1353

Why some politicians are more dangerous than others

by James Gilligan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James Gilligan 2011.

看美国政客的嘴脸

作 者: (美) 吉利根

译 者: 卢纪伟

责任编辑: 闫 红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70mm × 960mm 1/16

字数: 220 千字 印张: 15

版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4253-7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致谢

Acknowledgements

在

此向我的长期研究助手李班迪（Bandy Lee）博士表示深深的感谢，是她和自己在耶鲁大学统计和流行病学系（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and Epidemiology）的同事拉尼·德赛（Rani Desai）对本书中最复杂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李博士和她在精神病学系（Department of Psychiatry）的同事布鲁斯·维克勒斯（Bruce Wexler）提出了宝贵的编辑建议，我也对他们深表感激。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以及我的妻子卡罗尔（Carol）也提出了非常有益的编辑建议。

序

Preface

从一个新奇的角度了解美国政治

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强国，这点没有人质疑。美国人思想的开放也是人所皆知，所以，他们对任何事物的研究都是五花八门、角度新奇，而且还特别重视数据，有时会让人颇感意外。比如放在我们眼前的这本引进版图书《看美国政客的嘴脸》。从书名上看，我们一定以为这本书是描写美国政客相互斗争的场景的，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这是一部描写美国政党与犯罪率关系的书。

本书的作者詹姆斯·吉利

根是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学临床教授，对心理健康和暴力预防颇有研究。

那么，这位大教授的研究跟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研究的谋杀率和自杀率又跟这二党的政策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从中能看出哪个党的政策更好吗？

我们中国有句名言：“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位仁兄研究了1900年到2007年间一个多世纪的自杀率和谋杀率的数据，居然发现了惊人的结论：“政党和致命暴力率的相关性非常明显。共和党人入主白宫时，自杀率和谋杀率增加，而在民主党当政时减少，数量和持续性也是如此。”

作者在书中解答了“为什么暴力死亡率在共和党统治时增加，而在民主党统治时减少这个谜”。

说实话，我们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喜欢茶余饭后谈论政治的，尤其是对美国的关心好像都超越了对自己的关心，但是我们真正对美国的深入了解又十分有限。比如我吧，就一直没搞清楚美国共和、民主二党都代表谁，他们的执政理念有何区别。

这本书虽不代表出版者的观点和视角，但是，詹姆斯·吉利根新奇的描述和结论会给我们中国读者打开一扇

了解美国政客的窗子，也让我们想解了的美国更加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成君忆

2013年3月20日

引言

Introduction

谋杀之谜

本书阐述了一个谋杀之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系列关于谋杀的谜，也包括“自我谋杀”或者叫自杀。本书一开始，两个尚无人解答的问题引起了这一系列我试图揭开的谜。第一个谜是，为什么谋杀率和自杀率趋向于一起增加和减少（它们确实是这样）——而我们一般认为犯谋杀罪的人与自杀的人大相径庭（尽管他们并非总是如此，但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第二个谜是，在某一短暂的时间段内，构成人口的芸芸众生中间

不可能发生这么显著的变化，为什么人口中的谋杀率和自杀率波动还如此巨大——有时增加一倍多，有时减少到不到一半？

身为精神病学家，我曾经作为医生，对监狱里的杀人犯进行研究，也对与自杀冲动作斗争的特等病人（Private Patient）进行研究。我的问题并不是“谁谋杀了人”，也不是问在自杀情况下谁被引诱或者试图自杀（那个谜已经解开），而是“为什么”？有一段时间谋杀和自杀比率急剧上升，有人请我去解决马萨诸塞州监狱暴力蔓延问题。做这件事时，我发现人为能够控制暴力蔓延。

但是，出乎意料，我竟然发现了另一类（暴力）的蔓延。有些人对暴力的原因和预防感兴趣，而我则一直关注某一年到下一年美国和全世界报道的谋杀率和自杀率。我发现，某个时间段，这些比率急剧上升；其他时间段，等量急剧下降。自1900年以来，美国的谋杀和自杀比率都是按年度来通报的。谋杀率和自杀率趋向于一起上升和下降，对这一事实我分外好奇。这表明造成其中一个上升的任何因素可能也造成另一个上升。但是，我的注意力也被看起来像是山顶和山谷的模式吸引。我查询了从1900年到2007年间一个多世纪的自杀率和谋杀率（最后一年是可比数据），发现这些形式的致命暴力出现三次大规模的、猛

然的、持久的上升和下降。它们达到了顶点，随后就是等量急剧下降。上升和下降是急剧并且连续的（也就是说，它们持续几年没有中断；然后，比率在异乎寻常的高范围或者是低范围波动，持续好几年或者几十年）。这样，这些死亡率的图表看起来像是众多山峰或者是夹杂着山谷的山脉的剖面。事实上，这条山脉和山谷的区别非常大——山峰有时候是山谷的两倍高——这让我明白，我所看到的是一幅致命暴力蔓延的地图，中间有些时间段回归到趋于“正常”的比率，有些时候达到蔓延比率。

对于这些蔓延，我困惑了好几年，一直找不到有关其原因的蛛丝马迹。突然有一天，我注意到三次致命暴力蔓延与总统选举周期呼应。具体而言就是，共和党人一当总统，自杀率和谋杀率都开始上升到蔓延水平，并且在共和党人入主白宫的整个时期内一直保持在这一范围。在共和党人第一年或者是前几年执政期间，自杀率和谋杀率就开始上升；在他们当政的最后一年或者几年达到顶点。民主党执政之前，谋杀率和自杀率不会转向，不会下降到蔓延水平以下；而在新一届民主党政府执政第一年或者前两年，就开始下降，到了民主党总统任职的最后一年或者几年，比率通常达到最低点。我对这些年度变化进行数据分析，发现在所有三种情况下——自杀、谋杀以及总致命暴

力（意思是自杀率和谋杀率加在一起）——从数据方面来看，政党和致命暴力率的相关性非常明显。共和党人入主白宫时，自杀率和谋杀率增加，而在民主党政府统治时减少，数量和持续性也是如此，这不能仅仅归因于巧合。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怎么可能呢？毫无疑问，这不能那么简单，当然也不会那么简单。总统所在政党的政治标签使暴力死亡率上升或者下降，不可能这么简单。如果政党和暴力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非偶然的相关性，那么几乎不言而喻，这种因果关系必定置身于两个政党的政策和成就方面的差异以及这样的差异对人们的行为造成的影响之中。但是，存在这样的差异吗？能够证明这些差异对暴力死亡率产生影响吗？

为什么自杀率和谋杀率彼此平行？在一般人对暴力行为为想当然的看法面前，无论多么重要的数据都无济于事。自杀的人一般被认为是悲伤过度或者说疯了，通常在精神病办公室或者精神病医院见到他们。谋杀他人的人常常被视为罪犯，他们的行为被看成罪恶滔天。对于后者，大家一般会觉得他们需要的不是治疗而是惩罚；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在监狱里，而不是在精神病医院或者私人办公室。与之类似，自杀行为和谋杀行为的原因通常被归咎于个人。我们也预测，自杀的人有抑郁史，由遗传倾向抑郁症

发展到抑郁症，或者患有其他精神疾病，或者是遭受了极端创伤，或者是癌症晚期等身体疾病。相比而言，犯谋杀罪的人常常被视为道德方面的魔鬼——反社会的人、罪犯、“孬种”，或者仅仅简单地视为“邪恶”。即使这些数据表明自杀率和谋杀率彼此平行并且二者与总统选举周期有关，而且这些数据是由公务员、训练有素的流行病学家以及受雇于美国公共卫生署全国健康状况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of the US Public Health Service）的统计学家共同编辑的，但是，如果不重新考虑一下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大部分假设——谁自杀了，谁谋杀了，以及为什么——就很难相信这些数据。

因而，事实上事情并不简单，这个谜还在深化。的确，相关性——不论其由于巧合的可能性有多小——不能证明是原因。还记得有人半开玩笑似的声称美国橄榄球联合会（American Football Conference）的某支球队赢得超级杯（Super Bowl）后股市下跌以及国家橄榄球联合会（National Football Conference）某支球队赢后股市暴涨吗？很明显，41年来，有33年都很准，准确率达到80%。¹有时，就像这个例子一样，相关性仅仅是源于毫无意义的巧合，没有貌似合理的因果原理把二者连接起来。

1 2010年8月10日从Snopes.com/business……superbowl.asp下载。

或者是，相关性可能是由于第三方因素，问题中的两种现象都与之有关。如果心脏病比率与社会中手机的拥有比率有关，那么几乎可以确定这两个变量——心脏病和手机的拥有——都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有关。因而，可以说，社会经济发展实际上造成了心脏病的增加（由于一些因果原理，包括寿命延长，这样更高比例的人进入心脏病多发年龄段；锻炼频率减少，因为大家更有可能开车而不是步行去上班；饮食更加丰富，而食物则富含更多的脂肪和卡路里等）。然而，并没有假设这样一种因果原理，即，仅仅购买并拥有手机这件事让你患心脏病。

但是，政党和致命暴力比率之间的相关性又如何呢？这就是我要解开的谜。我是侧重于精神分析的精神病学家，又做过临床医生，接受了这方面的培训，拥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这些引导着我去寻求人们个人生活兴衰中——而不是政治事件中——内心苦楚或者是性格紊乱的源头。我阅读文学作品，熟悉约翰逊博士（Dr.Johnson）的断言——“所有人的内心忍耐多么有限啊，法律和国王都能伤害或者治疗它们。”这就是摆在我面前的证据，表明法律和国王能让人的内心承受难以忍受的事物，或者在相反的方向产生同样强大的效果。为了解开执政党和暴力死亡之间的相关性之谜，有必要弄清楚这一因果原理，

即，总统所在政党的变化能造成更多的人自杀或者杀死别人，或者相反，减少致命暴力的爆发率。

在第一章《生与死的问题》中，我列举了数据——并不是我的数据，而是美国政府编辑的那些数据。它们表明：（1）从1900年到2007年，自杀率和谋杀率的上升和下降情况；（2）这些致命暴力比率达到蔓延水平，随后又下降到非蔓延水平的三个时间段；（3）致命暴力比率蔓延的时间段与共和党政府的关系以及处于非蔓延水平与民主党政府的关系；（4）自杀率和谋杀率的同比变化说明了共和党执政的59年（基准年1900年之后）净累积增加，民主党执政的48年等量大幅减少。（“净累积”增加或者减少，我的意思是两党执政的年份内同比增加和减少的总量。从1900年到2007年，107年间暴力死亡率比上一年增加或者减少。在这些年份中，有59年共和党人执政，48年民主党人执政。例如，1900年美国的致命暴力率是每10万人有15.6人，1901年是17人，增加了1.4人。1902年，减少到15.7人，减少了1.3人，这样在共和党执政的这两年——1901年和1902年——净累积增长0.1人（也就是说，1.4减1.3，换言之是，15.7减15.6）。整个107年的时间段内，共和党执政的59年间，每10万人暴力死亡净累积增加19.9人，几乎等于民主党执政的48年间净累积减少的

18.3人)。

研究了这些数据，我的结论是，无论我怎么对它们划分——例如，把研究限制在大萧条之前，或者是“二战”前，或者是“二战”后等时间段，以排除某些重要而又特殊的历史事件而不是当时的执政党歪曲数据的可能性——一种发现一直不变：致命暴力（自杀和谋杀）比率仅在共和党政府时期上升到蔓延水平，而且仅在民主党当政时减少到这些水平以下。那样的结果就是，同比变化总量表明，在共和党人统治下，自杀和谋杀都净增加，而在民主党人统治下净减少，即使是在很短的时间段内。考虑到政党和暴力死亡率之间的相关性很稳定，我不能去推翻它。这个问题依旧是：它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发生并且反复发生？身为医生，我的兴趣一直是生与死的问题，而非政治。由于一个偶然的发现，它牵涉到政治演员。再者，我试图了解造成这些死亡的原因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拯救生命，这样我就涉足到政治中。

在第二章《你是什么类型的人？》中，我问道：除了总统所在政党的变化之外，还有其他社会环境方面的变化——例如，失业率和失业周期的变化，衰退和萧条的频率、深度和周期的变化，或者是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度的变化，也与暴力死亡率的变化有关？这些经济措施的变化

也属于增加或者减少人们自杀或者是谋杀动机的因果原理吗？

在第三章《没有什么像失败那样成功》中，我拓展了研究范围，追问第二章中分析的经济条件是否是因为哪一个政党上台而增加或者减少（暴力死亡率）。研究过程中，我遇到了包含一个新谜的悖论：为什么那个声称代表着繁荣与经济增长的政党、代表着公共安全和“法律与秩序”的政党、对犯罪和毒品“宣战”的政党，却与更高的致命暴力比率、失业和衰退相关？如果一个政党一直给公众带来比另一个政党更高度的经济压力和贫困，实现的繁荣度和经济安全度又比另一政党低，那就意味着经济上是失败的而不是成功的，那么它如何能继续赢得选举，保持活力呢？

在第四章《都是因为耻辱》中，我来到了这个谜的核心部分：唤起侵略性冲动去杀死他人的情感，以及唤起把侵略行为重新指向自己——也就是自杀——的情感力量。在《暴力：对一种全国流行病的反思》一书中，我分析认为耻辱是暴力的近因，是暴力行为的必要动机——尽管并

不是充分动机。¹

在第五章《谁愿意成为冗余者？》中，我想了解失业、相对贫困以及突然失去社会和经济地位是否像观察的一样加剧了耻辱感。如果的确如此，这能在政治和经济事件与个人行为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尽管我们清楚，在一些闲谈轶事中，如果一个人经济破产，他可能自杀，但我们依旧不认为这些悲剧性例子是暴力蔓延的一部分。我们都听说过经济上的“涓滴”理论，但是，既影响郁郁寡欢者或者是疯子，又影响恶棍或者是无赖的暴力涓滴理论又怎么样的呢？

在第六章《红州、蓝州：荣誉与愧疚》中，我变换了思路。我不再研究一类人口（美国人）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发生的变化，而是分析不同的人口（红州与蓝州，也就是说，共和党占据多数选民的州与民主党占据多数选民的州）在同一个时间段——2000年以及2004年，彼此差异的方式。这样做时，我将研究这两组州的文化差异以及共和党选民与民主党选民之间的个性差异。

在最后一章《谜底已经揭开：将要采取什么办法？》

1 詹姆斯·吉利根著，《暴力：对一种全国流行病的反思》，纽约，古典书局（Vintage Books），1997年。原版名为《暴力：我们的致命流行病及其原因》，纽约，格罗塞特普特南出版社（Grosset/Putnam），1996年。也可参看詹姆斯·吉利根的《耻辱、愧疚与暴力》一文，《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70（4）：1149—1180，2003年。